



王永生 著

# 论鲁迅的文艺批评

贵州人民出版社

78.01SI  
SOS

责任编辑 彭鹤松  
封面设计 邹刚

**论鲁迅的文艺批评**

王永生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20千字

印数 1—4,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546 定价: 2.1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系统地论述鲁迅在文艺批评方面光辉业绩的一部专著。除卷首的总论外，其余分别就鲁迅在“五四”以来历次文艺问题论争与文艺思想斗争中的重要功绩，以及鲁迅关于中外古今一系列作家作品所作评论，共二十九个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材料丰富，论据充分，立论新颖，文字浅显，适合广大文艺爱好者阅读。

## 出版说明

一、我们出版的这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主编。

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丛书》所收入的专题研究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我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情况，并重点研究我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文学批评活动，评述其文学主张，论析其评论实践，总结其在我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以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起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同一研究对象所获得的不同研究成果，只要论点明确，言之成理，我们将从有利于学术讨论的角度出发，考虑予以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目 次

论鲁迅的文艺批评.....( 1 )

鲁迅与“五四”时期文艺思想斗争.....( 37 )

鲁迅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 56 )

鲁迅与粉碎“文化围剿”的斗争.....( 74 )

鲁迅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 88 )

鲁迅关于同时代我国作家的评论.....(105)

鲁迅关于不良创作倾向的评论.....(125)

鲁迅关于苏联革命作家的评论.....(136)

鲁迅关于苏联“同路人”作家的评论.....(151)

鲁迅关于美术作品的评论.....(166)

鲁迅关于电影影片的评论.....(181)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194)

鲁迅论阮籍、嵇康、陶潜.....(203)

鲁迅论《三国演义》.....(213)

鲁迅论《水浒》.....(223)

鲁迅论《西游记》.....(238)

鲁迅论《金瓶梅》.....(252)

鲁迅论《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262)

|                         |       |
|-------------------------|-------|
| 鲁迅论《儒林外史》 .....         | (272) |
| 鲁迅论《红楼梦》 .....          | (282) |
| 鲁迅论《野叟曝言》、《儿女英雄传》 ..... | (295) |
| 鲁迅论清末谴责小说 .....         | (303) |
| 鲁迅论拜伦与雪莱 .....          | (312) |
| 鲁迅论裴多菲、普希金、密茨凯维支 .....  | (322) |
| 鲁迅论果戈理 .....            | (334) |
| 鲁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        | (347) |
| 鲁迅论易卜生与萧伯纳 .....        | (359) |
| 鲁迅论托尔斯泰与契诃夫 .....       | (371) |
| 鲁迅论安特莱夫与阿尔志跋绥夫 .....    | (383) |
| 鲁迅论勃洛克、叶遂宁、梭波里 .....    | (396) |
| 后 记 .....               | (406) |

## 论鲁迅的文艺批评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不仅在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的文学创作领域，以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创造性劳动，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不仅在文学翻译、文艺队伍建设、古籍整理与文学研究等方面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在文艺批评方面，也以卓有成效的劳动，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占领有关阵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 —

鲁迅所从事的文艺批评，时时事事都在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与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需要。正象他很早就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目的一样，在文艺批评方面也一直反对一些评论家不能从大处着眼，不能从广泛的社会需要落墨，尽作一些“身边批评”。他曾经说过，有些“批评者的眼界是小的，所以他不能在大处落墨，如果受其影响，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给他们收小了”<sup>①</sup>。“这些批评家之病亦难治。他们斥小说家写‘身边琐

<sup>①</sup>鲁迅：《致徐懋庸〔1934.6.21.〕》。

事’，而不悟自己在做‘身边批评’，较远之大敌，不看见，不提  
起”<sup>①</sup>。

一九〇七年，鲁迅最早向我国读者评介拜伦、雪莱、歌德、裴多菲等一大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摩罗诗人时，便分明地为了在我国唤起“精神界之战士”，热忱期望这些战士能“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援吾人出于荒寒”<sup>②</sup>。在一九一九年所写的那一系列“随感录”中，他郑重评介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作者所写的《爱情》诗，称它洋溢着“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热情赞颂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认为“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并严正指斥反对白话文运动、叫嚷“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的“现在的屠杀者”，以及“攻击新文艺新思想”，“大骂别的美术家‘盲目盲心’”的美术刊物《泼克》，强调“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等等<sup>③</sup>。其目的也正是为了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能扫除思想障碍，把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

由于鲁迅时时考虑人民大众的社会需要，密切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从事文艺评论，自始至终不是孤立地评析文艺现象，因而一方面使评论文字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与现实感，一扫“为评论而评论”的陈旧习气，而且往往能得出一般评论者所无法获得的结论。当易卜生的《娜拉》引进我国，剧作所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引起我国广大反帝反封建战士强烈反响时，一般论者对妇女如何走出厨房，如何摆脱旧道德观的束缚，如何争取个性解放等具体问题议论较多，然而鲁迅对《娜拉》的评论却不完全一样。他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先后在《我们现在怎样做

---

①鲁迅：《致郑振铎〔1934.6.21〕》。

②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③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四十六、五十七、五十三、四十三。

父亲》、《娜拉走后怎样》里，却及时尖锐地提出，这不仅是妇女个人的人格获得独立，或摆脱资产阶级道德的问题，而实在关系到经济权柄，乃至社会经济制度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①。

联系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高潮与鲁迅所写作的《杂忆》、《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诗歌之敌》，以及《革命文学》、《革命时代的文学》等等，联系一九二九至三二年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与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写作的《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论“第三种人”》，以及《上海文艺之一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等，无不具体看到鲁迅服从我国人民革命事业需要从事文艺评论劳动的崇高行动契机。

一九三三年二月，萧伯纳来上海逗留了一天。由于萧在香港大学曾鼓动青年学生争取进步，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便拚命攻击、诽谤。萧还未到达上海，绅士淑女们便纷纷出动。为此，鲁迅于二月至八月，连续写作了《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等七篇评论，针对当时对萧伯纳的种种非难，具体地评析了萧的思想和创作。他在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件中说得好，“对于萧的言论，侮辱他个人与否是不成问题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

“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的讲演。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从来没有能去投一个炸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②。

①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②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通信（复魏猛克）》。

在鲁迅的战斗一生中，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帮助别人校阅了不少译作，使之顺利与读者见面。他在校阅《铁流》时曾经表示，“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sup>①</sup>。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外过去时代的作品，能够有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sup>②</sup>。对于一些并非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要求其没有一点非无产阶级的偏见，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在文艺创作中也不能保证不含有一点错误见解。通过这样的序文，评论者倘能“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读者便可以获得“对比参考”，其结果“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sup>③</sup>。本着这样的认识，鲁迅不仅不辞辛劳地写作了推荐苏联革命作家高尔基《母亲》、《俄罗斯的童话》、《一月九日》，法捷耶夫《毁灭》，绥拉菲摩维支《铁流》，革拉特珂夫《士敏土》，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珂德》、《浮士德与城》，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等评介文字，而且撰写了关于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绥甫林娜、雅各武莱夫、拉甫列涅夫、左琴科等人一系列作品的评论，并多次评介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勃洛克等人的创作。

在鲁迅生活和战斗的年代，文艺批评领域曾有一些人从个人和小圈子的私利出发，搞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拉帮结派、相互吹捧的一套。对于这种“自有一伙”、充斥商贾习气的文艺批评，鲁迅深为不满，曾经指斥这批人是“捐班”文学家，是“商定”的“文豪”，是“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

---

①鲁迅：《集外集拾遗·〈铁流〉编校后记》。

②鲁迅：《译文序跋集·〈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③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家，是一伙靠资产阶级“法术”“爬上去”的“投机商”。有些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sup>①</sup>。更有甚者是苏汶，在他以“中国文艺年鉴社”名义，实则亲自编纂的《中国文艺年鉴》中大肆自我吹捧，在该书“鸟瞰”部分中，一会儿吹嘘“苏汶先生的议论”，一会儿又颂扬“杜衡先生的创作”，实际上讲的都是他自己“一个人”<sup>②</sup>。

鲁迅坚决摒弃这种行帮式批评与种种资产阶级庸俗评论作风，哪怕是对于良师挚友，也不徇私情。比如章太炎，是鲁迅所尊敬的一位老师、前辈。当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指使御用文人以“一代儒宗”、“国学大师”等学术华袞掩盖章太炎早年曾经是民主革命斗士的战斗业绩时，鲁迅挺身而出，义愤填膺地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然而，鲁迅也决不为贤者讳，而毫不容情地公正指出，“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为论者所不满”。当年他虽有“排满之志”，“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而已<sup>③</sup>。

对于挚友刘半农也一样。鲁迅既肯定他“五四”初期作为

---

①鲁迅：《准风月谈·各种捐班》、《准风月谈·“商定”文豪》、《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②鲁迅：《花边文学·化名新法》。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时的“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但对他后来“据了要津”、“禁称‘密斯’之类”，接着又“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等等，却很为不满，终于明确表示，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刘半农为人直率，“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鲁迅虽肯定了刘半农的这些方面，却同时毫不留情地指出，他的这种直率，有时毕竟“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sup>①</sup>。并不因私人关系密切，而对章太炎、刘半农该批评指责处有丝毫徇情、手软。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我国曾经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对不良创作倾向与错误文艺思潮采取不闻不问、事不关己的态度。每当有人坚持原则、开展必要的批评时，这些人往往以“不偏不倚”的姿态，露出一副“和事佬”面容，将有关评论统称之为“互骂”。什么“文坛的悲观”、“文人相轻”呀，什么“军阀混战”、“漆黑一团糟”呀，感慨之声于是纷起。对于这种评论者自身软弱无力、毫无原则，却又反对别人有鲜明爱憎的不明是非者，鲁迅一向持否定态度。在鲁迅看来，文艺评论领域也确有粗暴、错误的文字，要克服这些缺失，只能“用批评来抗争”。其结果，“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sup>②</sup>。而“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sup>③</sup>。“含含糊糊的扑灭‘谩骂’”，实际上则是在“包庇了一切坏种”<sup>④</sup>。

鲁迅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于各种反动文艺观点与错误文艺思潮，对于不良创作倾向，总是进行及时的批评，乃至必要的批判斗争。“五四”时期，他的《估〈学衡〉》曾有力地揭去

---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

④鲁迅：《花边文学·谩骂》。

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梅光迪之流“学贯中西”、“昌明国粹”的伪装，使这一伙打着“学者”招牌的复古派痛定思痛，不再吭声；他的《评心雕龙》、《答K S君》、《十四年的“读经”》、《忽然想到〔六〕》、《古书与白话》、《再来一次》、《我还不能“带住”》等一系列战斗文字，将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推行复古主义，妄图阻挡新文化运动历史潮流前进的种种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在文艺创作领域，不论出现“锋利肃杀”或叫喊“杀，杀”、“打，打”等标语口号化、公式概念化倾向，还是当有些作者沉湎于表现“身边琐事”，作“无病呻吟”，或沾染了旧文人种种庸俗习气时，鲁迅也总是及时撰文提出批评。对于林语堂等人“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sup>①</sup>的幽默，更多次进行了严肃批评，揭示了林语堂之流所崇尚的“抒写性灵”之类，则是在侏子手棍棒下“自装鬼脸，自作怪相”<sup>②</sup>的本质，直到最后分道扬镳，林语堂听不进任何忠言规劝、顽固坚持错误为止。对于鸳鸯蝴蝶派文人标以“梦”、“魂”、“痕”、“影”、“泪”之类的作品，鲁迅也早就进行了批评，揭示了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独特产物的性质、渊源及其出路，要求有关作者尽快改变这对于社会的“互害的局面”<sup>③</sup>。对于张资平按照三角恋爱公式所炮制的小说，鲁迅还曾写作专文进行了评论<sup>④</sup>。鲁迅自己曾经说过，“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sup>⑤</sup>。但为了维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了革命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一直坚持真理，破除情面，将文艺批评当作浇

---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②鲁迅：《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③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热风·随感录六十四》。

④鲁迅：《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⑤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花除草的有力武器，生命不息，始终紧握这一武器战斗不止。

说到灌溉佳花，扶植“佳花的苗”，鲁迅确实耗费了毕生的大量心血。他不仅不厌其烦地帮助一大批作者校订不少作品，帮助这些作品获得出版、发表机会，而且为一大批作品写作了评论，使作者们认清创作的成败得失，使这些作品在读者中扩大了影响。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作的序言，是一篇系统总结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一部分文学社团成员小说创作的重要评论，不仅概述了一大批小说作者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成败，而且充分重视作者的创作个性，具体帮助有关作者在现有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独特风格，为文学事业的繁荣作出更有特色的贡献。他不仅在日常的通信往来中，具体评论了作家茅盾、郑振铎、张天翼、艾芜、沙汀、许钦文、叶紫、萧军、萧红，以及美术工作者陶元庆、司徒乔、陈烟桥、罗清桢、何白涛、李桦、陈铁耕、赖少其、刘岷、段干青、姚克、张慧、曹白、吴渤等人的创作，而且为十多位青年作者的作品写作了序言，要言不烦地评述了这些作品的成就及其不足。针对当时那些“在嫩苗的地上驰马”、“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的卑劣行径，以身作则地为文艺领域的幼苗们作了“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sup>①</sup>。

当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在《拓荒者》、《申报·艺术界》上遭到一些貌似“彻底革命”者的无理非难以后，鲁迅立即写作《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对有关论者的谬误及时予以答辩澄清。当年轻的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在《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觉悟》上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以后，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对有关评论的错误文艺观与道德观进行了据理辨析。当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遭到张春桥之流的恶毒攻击诽谤以后，鲁迅又写作《三月的租界》给予有力的回击。对于青年女作家冯沅君在“五四”时期能写作《旅行》等短

<sup>①</sup>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篇小说，作为“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对于女作家婚后“秉性疏懒”，“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时，鲁迅便诚恳地以裴多菲《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一诗，鼓励青年女作者改变状况，不间断地“唱出甜美的歌来”<sup>①</sup>。

鲁迅曾经说过，“文艺必须有批评”<sup>②</sup>，“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sup>③</sup>，“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sup>④</sup>；“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sup>⑤</sup>。他自己的文艺批评实践，正给这一系列可贵见解，作了最生动、最具体的说明。

## 二

在鲁迅生活与战斗的年代，有些人从事文艺评论只是从书本概念出发，机械地搬用一些名词、术语，向各种文艺作品硬性套去，合则拚命叫好，不合则挥棒打杀。鲁迅对这种文艺评论很为不满。早在一九二二年，他就曾提及有些人以评论界“权威”自居，“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只会“说些应当如此如彼”进行评论的情况，认为这些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到文坛上来践踏”，连“就事论事”都谈不上，充

---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②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

③鲁迅：《译文序跋集·〈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④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⑤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

其量只能算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sup>①</sup>。

在鲁迅看来，既然社会生活无比丰富复杂，评论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文艺现象，就应当适应评论对象的现实情况，从多采多姿、生动具体的文艺现象的实际状况出发，力求“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决不能“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sup>②</sup>。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作家的作品，要真正从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出发，善于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sup>③</sup>。从事文艺批评者，应该做到，“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如果是翻译的作品，“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哪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sup>④</sup>。

鲁迅的文艺批评正实践着上述主张。这样做，较之那些单凭固定的条文到处乱套，“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sup>⑤</sup>式的评论，当然要艰苦细致、麻烦费事得多；但作为真切的文艺批评，却应该以此作为最起码的要求，来不得半点含糊。对此，鲁迅曾从自身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作介绍文学，颇不易为”<sup>⑥</sup>。比如关于陶元庆绘画的评论，鲁迅既考虑到当前时代的要求，又考虑到民族风格的发扬，还考虑到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的应有贡献，从而指出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

---

①鲁迅：《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②鲁迅：《伪自由书·透底》。

③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

④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⑤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⑥鲁迅：《致李桦〔1935.4.4〕》。

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sup>①</sup>。

在鲁迅看来，必须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于评论对象作多方面的调查了解，才能从事真切的文艺批评。比如倘“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sup>②</sup>，并且“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sup>③</sup>，与此同时，还得“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sup>④</sup>；如果还有能如实介绍作者的基本情况及其作品时代背景的材料，倘能广泛接触还可对作者的思想与创作的各个侧面有全面确凿的了解。鲁迅曾向我国作家、评论家推荐高尔基的《回忆杂记》，认为这部作品所提供的有关托尔斯泰的生平回忆，对于人们了解托尔斯泰从事文学创作的“那历史底背景”，从而开展对于作家的评论、研究大有裨益<sup>⑤</sup>。

鲁迅认为，唯有将评论对象的基本情况，以及所处的具体环境、社会状态了解得细致，并兼想到作家周围的情况，就有可能把作家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把作品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就不致于孤立地仅着眼于某一作家、某一作品进行就事论事的评析。所以在评论某一作家作品时，除了至少要多看一点作者的其他作品，了解作家的各方面表现，还得广泛地接触作家所属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有关风土人情等情况的材料。比如鲁迅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论，便将作家放在一八六一至一九〇五年俄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考察，因而能看出托尔斯泰所鼓吹的不合作主义、无抵抗主义确有其虚妄、空泛的一面；但他要求改变人的奴隶地位，促使人们在思想上觉醒，毕竟有“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的一面，也不能全然

---

① 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② 鲁迅：《花边文学·读几本书》。

③ 鲁迅：《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④ 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

⑤ 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七）》。